

农地流转中的禀赋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理论分析框架

胡新艳, 杨晓莹, 王梦婷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禀赋效应前沿理论, 归纳和梳理出一般物品交易中禀赋效应的影响因素, 进而将其应用于我国农地流转的交易情境下, 从人地依赖关系、人地权利关系维度构建一个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并且分析了禀赋效应影响机制的代际差异, 从而从农民与农地之间的行为心理特征角度, 丰富和拓展农地流转问题研究的理论视角, 为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政策制定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 农地流转; 禀赋效应; 人地关系; 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 F 30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7)01-0105-08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xkb.2017.01.014

总体而言, 我国农户经济依然是“小农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 超细小的农场规模是近 30 年来我国现代农业建设成效不显著的“罪魁祸首”^[1]。因而以规模经营为导向的农地流转集中成为我国农业政策的基本导向。但已有调查研究显示: 我国流转市场发育总体滞后^[2]。截至 2014 年上半年, 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仅为 3.8 亿亩, 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 28.8%^①, 且主要发生在小农户之间。就农地流转滞后的原因, 早期文献主要从农地产权^[3]、城乡二元体制等宏观制度层面^[4], 以及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微观主体角度^[5]展开诠释和讨论, 众多的影响因素得到了深刻分析。但上述研究均以理性市场化为假定前提, 将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仅仅视为交易收益权衡的结果, 以致忽视了中国特殊农情下农民与农地之间的行为心理特征, 而这恰恰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口。

以行为心理因素为切入点, 学术界引入禀赋效应概念对农地流转滞后的原因展开了一些颇具启示的探索性研究。钟文晶等首次验证了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对农地流转的抑制效应^[6]。此外, 陈通等将禀赋效应作为中介变量, 同样也得出了禀赋效应抑制农地流转的结论^[7]。虽然上述研究初步验证了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对农地流转的抑制效应, 但均以农户为研究对象, 这不符合禀赋效应是个体判断的概念逻辑, 可能会导致主体回应偏差, 降低结果可信度; 此外, 以上研究尚未系统地探究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因何而产生? 也未关注到禀赋效应作为一种心理行为现象可能存在的代际差异特征, 也就无法辨识禀赋效应是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长期性抑或短期性因素? 鉴于此, 本文以农民个体为研究对象, 阐明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产生的内在机理, 并从代际比较的视角阐释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存在的可能差异, 归纳出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框架。

一、禀赋效应的概念、心理机制与测度: 一般物品交易到农地流转

1. 禀赋效应的概念、心理机制及其存在性

禀赋效应的概念由 Thaler 首次提出, 它是指与得到某物品所愿意支付的金钱(willingness to

收稿日期: 2016-07-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创新团队滚动支持项目“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IRT-14R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村土地与相关要素市场培育与改革研究”(713330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分工经济、服务外包与农业规模经营方式创新”(14BJY111)。
作者简介: 胡新艳(1972-), 女,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与制度经济。
① 数据来源于 <http://news.sohu.com/20141204/n406663998.shtml>

pay, WTP)相比,个体出让该物品所要求得到的金钱(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通常更多^[8]。禀赋效应可以用中国的俗语“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敝帚自珍”等形象生动地表达,其定义中的 WTA 和 WTP 既可以是同一个体给出的价格,也可以是买方和卖方给出的价格。禀赋效应的测度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减值法,即用 WTA 减去 WTP。如果两值相减后为正,则认为存在禀赋效应;若为零或负值,则不存在禀赋效应。另一种是比值法,即用 WTA 除以 WTP,当两者的比值大于 1 时,认为存在禀赋效应;如果两者的比值为小于等于 1 的数,则表明不存在禀赋效应。由于比值法可以消除量纲的影响,便于不同价格物品的禀赋效应比较研究,因此,被更为普遍地采用^[9]。

禀赋效应究竟因何而产生呢?从心理机制角度而言,损失规避心理是目前最为主流的解释。损失规避是指失去一件物品时损失的效用要大于获得该物品时得到的效用,损失带来的影响大致是同等收益带来的影响的 2 倍^[10]。之所以出现这种心理现象是因为卖者把失去物品看作损失,把得到金钱看作收益;而买者将失去金钱看作损失,获得物品看作收益。但损失规避在价值函数上表现为损失区的价值函数曲线往往比收益区更陡峭,即损失比等量收益所产生的心理感受更加强烈;为了弥补损失所带来的痛苦,卖方倾向于提高价格,而买方倾向于降低价格,从而产生禀赋效应。但是后续研究表明买方对物品的估价几乎与物品的真实价值相等,因此禀赋效应并不是由于买方不愿意买,而是由于卖方不愿意卖,而且仅在获取更高价格才肯卖而产生的^[11]。禀赋效应是否为稳定、普遍的个体偏好?学者们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检验,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肯定性结论。其中,“咖啡杯交易”是被广为熟知和引用的经典实验^①。后续相关研究表明:从个人所拥有的商品形态看,无论是对巧克力等有形物品^[11],还是对空气等无形物品^[12],甚至是土地、房屋^[13]等资产和权力,个体都会产生禀赋效应。从商品所有权状态而言,从个体独自拥有咖啡杯等物品,到大家共同拥有的野生生物保护区^[14]等,个体都表现出禀赋效应。这些研究表明禀赋效应是个体偏好的一个基础性、本质性特征。

2.农地流转中的禀赋效应:存在性检验

禀赋效应对物品交易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使得人们不愿意放弃物品,无法形成物品的有效供给,导致市场交易难以达成;二是影响消费者对物品的价值预期,引致高估物品的价值,出现单方面的提价行为,使得市场供求的均衡价格难以达成,从而抑制交易行为^[15]。那么,农民在土地流转中是否会产生禀赋效应?这个视角方面的研究直到最近两年才被引入到农地流转交易研究中,成果积累相对较少。钟文晶等采用情景问卷的方式调查了广东省 38 个村的 271 户农户,通过询问同一农户对于农地转出意愿租金最低价格(WTA)与农地转入的意愿租金最高价格(WTP),由此计算禀赋效应并进行显著性检验,首次验证了农地流转中不仅存在禀赋效应而且显著,并认为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惜地”与高估其拥有的经营权价值是普遍的现象^[6]。他们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禀赋效应依“亲友邻居—普通农户—生产大户—龙头企业”而逐次增强,存在差序格局特征。陈通等以“风险认知与情绪因素-禀赋效应-农地流转行为”为分析线索的研究表明,禀赋效应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抑制作用的解释率达 71.2%^[7]。

从已有文献看,到目前为止禀赋效应在农地流转中的存在性已经得到了初步的验证,而且这一概念的引入对原有农地流转研究的观点及其结论形成了挑战,并引发了人们对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背后行为心理因素的关注和重视。但是已有研究以农户代替个体的研究方法可能引致研究结果的偏差,也未系统阐释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以及可能存在的代际差异特征。

二、“人—物”依赖关系与禀赋效应:一般物品交易到农地流转

为了分析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因何而产生,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禀赋效应前沿理论,归纳和梳理出禀赋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而将其应用于我国农地流转的交易情境下,构建一个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影

① Thaler 和 Kahneman 等把价值约 5 美元的咖啡杯分配给一组学生,让其给出愿意出售此杯子的最低价格,同时另一组没有杯子的学生给出愿意购买此杯子的最高价格。结果,有杯子的学生意愿卖价的均价为 7 美元,而没有杯子的学生意愿买价均价为 3.5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 2 倍。这是因为拥有杯子的学生把杯子看作是一种禀赋,会提高对其的估价。

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1.“人—物”依赖关系与禀赋效应:一般物品交易

物品交易中 WTA 与 WTP 之间的差异是卖方损失规避的表现^[8]。也就意味着卖方损失规避心理的强烈程度决定着禀赋效应的强弱。从本质上而言,物品交易既是人与物之间客观的物理剥离过程,同时也是人与物之间的情感剥离过程^[16]。损失规避心理的强弱与这种剥离过程痛苦程度相关。正如 Kahneman 等所阐释,WTA 和 WTP 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拥有物品的人在出让物品时会经受分离的痛苦^[17]。即使在交换过程中又拥有了另一物品,也不能弥补分离带来的痛苦。交易中个人与物品分离带来的痛苦程度越大,个人的损失规避心理就越强,禀赋效应越大。那么,这种痛苦程度具体是由什么因素所决定呢?事实上,影响这一物理和情感双重剥离过程中痛苦程度的因素有很多,既有客观物质层面的,又有主观心理层面的^[18]。一般而言,物品的实用功能及其价值越大,人与物之间的客观依赖关系越强,个体的损失规避心理程度和禀赋效应强度越大;个体对物品拥有越强的情感依赖关系,情感剥离的过程就越痛苦,表现出的损失规避心理和禀赋效应就越大。

(1)客观依赖关系与禀赋效应。“人与物”的客观依赖关系方面,已有学者研究发现,物品类别、物品的可替代性、物品的重要程度和对物品属性的认知等都会影响个体的损失规避心理强度,对物品形成不同的价格感知度,进而影响禀赋效应。从物品类别看,Kahneman 等认为“事物损失规避的系数会随着不同的事物而有所不同,这反映了这些事物的重要程度”^[19]。后续研究也证明损失规避系数 λ 不是一个恒定的常量,而是随着个人面临事物的不同而变化的动态变量。Thaler 则以实验的方式说明了这一观点,其研究表明对于安全、健康和生活环境等,损失规避的效应比一般的交易情境更强烈^[8]。从物品属性看,当物品的属性与其他物品相似度较高时,人们对其客观依赖程度较低,人们失去物品就不会有损失规避的感受。以物物交换为例,物品之间的属性相似程度越高,物品之间的交换率也就越高^[20]。而当物品的可替代性低时,个人不愿交换已获得物品,即使进行交换也要求更高的价格,从而引致禀赋效应。更进一步地,个人对物品属性了解程度的高低也会影响其禀赋效应。Van 等以酒为例,验证了对物品的属性了解程度越高,相应的禀赋效应就会越强的观点^[21]。

其实,无论是物品类别、物品重要性、物品替代性还是对物品属性的认知,最终所反映的是物品的客观功用效能对人而言的重要性或可替代性,也即是物品为个人提供越多的支持,越是重要,可替代性越低,由此产生越强的损失规避心理,要价越高,衍生出越强的禀赋效应。

(2)情感依赖关系与禀赋效应。事实上,物品是通过外部世界进入人的观念的,由此从心外之物转为心中之物,从而外界的物就从客观的自在状态转化为由人主观解读的内在意义构建状态,呈现出心物关系的情感特征^[22]。这意味着,物是有心之物,人会对物品形成情感依恋关系。对物品的情感依恋、情绪等会影响个人的损失规避心理,进而影响禀赋效应,这已得到了相关实证文献的证实^[23]。而且,已有研究表明,情感因素的影响似乎大于对物品的客观依赖。因为如果存在两类物品,一类是情感依赖度高而实用价值低的物品,一类是情感依赖度低而实用价值高的物品,人们更不愿失去的是自己喜欢的物品,而并非实用价值高的物品^[24]。

人与物之间的情感依赖关系形成,一方面与时间的积累因素有关,人们对物品的拥有时间越长,决策前深思熟虑的时间越长,对物品的情感依恋越高,他越会有一种“选择后感觉到失去”的感受,会高估物品价格^[25],衍生出禀赋效应。另一方面,与物品承载主体的某种特殊记忆或情感价值相关,这类典型的物品有结婚戒指、传家宝和家宅等,它们几乎难以被拿去交易,这类物品被 Radin 定义为“人格化财产”^[26]。这类财产是自我延伸的一部分,是自我身份的象征,它与个体的人格紧密相连,与主体间具有难以割裂的深厚情感,因此人格化财产的失去如同失去自我的一部分,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27],这种痛苦使得无法通过替代物来弥补。因此,对于人格化财产的交易,这份意义和情感会连同物品本身价值同时纳入定价决策中,出现与理想市场不一样的定价机制,使得意愿卖价远高于买者的预期价格,产生强的禀赋效应,影响正常交易的达成。事实上,人们对物品产生的情感依恋,即使是在物品被交易、彼此分离后,也不会立刻消失,可以在所有者和物品分离后继续保持,表现出渴望控制物品未来命运的偏好^[16]。

2. 人地依赖关系与禀赋效应: 农地流转

“人与物”的客观依赖关系和情感依赖关系均会对个体的损失规避心理及其禀赋效应产生影响。但交易都发生在特定的情景下,不同交易物品具有不一样的特征,因而会表现出不同的损失规避心理及其禀赋效应敏感度。依上述理论逻辑,引申分析我国特殊农情下人地关系及其对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的影响。与土地私有制国家不同,我国农地属于集体所有,不存在农地买卖的交易市场,仅有从我国农地集体所有权分离出且依附于农地承包权的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但农地流转后,农户会失去附着在土地之上的权利,也不能享受土地为其带来直接收益。因此,农地流转中,农民依然会衍生出损失规避心理,产生禀赋效应。

(1) 农民对土地的客观依赖关系及其代际分化对禀赋效应的影响。① 农民对土地的客观依赖关系与禀赋效应。我国“农地集体所有,农户均田承包”的地权制度安排,并非完全是基于要素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原则,而是体现了农民生存伦理的“道义原则”^[28]。已有主流研究强调土地之于农民的就业、收入与社会保障功能,由此形成农民对于土地三重功能的客观依赖。但随着改革以来农民就业、收入等的分化,农民对于土地功能依赖的程度以及类型也随之分化。对于以农为生的农民而言,土地要素的就业、收入功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保障功能依附于土地生产要素功能。但是对于实现了非农就业转移的农民而言,他们不再依赖于土地提供的就业、收入功能,对土地的依赖程度相对降低,但是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并未被消解。因为尽管他们在城里就业、生活和消费,但其就业具有鲜明的被动性和不确定性^[29],始终难以实现永久迁移的完全城市化,其结果是:进城农民所获得的权力、福利与保障等远远不及本地居民,成了“就业、收入和消费”与“长期保障或者社会保障”相分离的特殊群体^[30];这意味着,农户一旦转出了土地,将失去一定的再择业的空间,也会造成对农村原有“家庭养老+土地保障”模式的冲击。因此,农地对他们而言,仍然发挥着生存保障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可见,无论是以农为生的农民,还是实现了非农就业转移的农民,土地都具有“风险规避”意义,持有土地依然是一种社会保障。土地这种不可或缺的功能和作用,导致农民将农地转出视为一种“生存保障损失”,在农地流转的利益诉求中,会在土地要素价值上叠加社会保障价值,出现单方面的提价倾向,从而强化流转交易的禀赋效应。② 农民对土地客观依赖关系的代际分化与禀赋效应。我国农民的就业、收入以及经济分化都表现出代际差异特征。这种分化必然导致农民对土地的客观依赖关系存在代际差异特征,因此,有必要分析因农民分化而引发的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的代际差异特征。

改革以后,农民获得了农地财产权利以及身份自由的双重解放^[31],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出现了农民就业从农到非农的职业分化。以农民职业分化为起点,带来了农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农民的经济分化^[32]。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农民的职业分化、收入分化还是经济分化,都表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特征。以改革开放的1978年为时间节点,将农民相应划分为老一代、新一代农民^[33],发现老一代农民留在农业部门的比例远高于新一代;而且,两代农民在非农就业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新一代农民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和适应力,融入城市生活的可能性更高^[34],他们在城市的住所、工作单位相对固定,收入相对稳定,也享有相对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因此,新一代农民对土地所承载的就业、收入以及社会保障等功能的依赖度也低些。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推论是:新一代农民对于土地的客观依赖程度更低,这会减弱他们在农地流转交易中的禀赋效应强度。

(2) 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依赖关系及其代际分化对禀赋效应的影响。① 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依赖关系与禀赋效应。“人—物”情感依赖关系对于物品交易中的禀赋效应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乡土社会中,农民靠土地生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35],他们对土地拥有天然的情感依赖和心理依赖,认为拥有土地是天经地义之事,非常强调土地占有和经营关系的稳定。因而对于农民而言,土地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要素,而是凝聚了情感因素的难以替代的人格化财产;相应地,我国的农地流转市场并非完全竞价的要素市场,农民的农地流转也并非是由价格作为引导的纯粹经济交易行为,而是表达了情感、身份权的特殊交易行为。农户的“恋地”情感以及持有的农地人格化财产的概念,易于导致其夸大农地的转出要价,强化禀赋效应。不过,在今天市场经济转型的条件下,关于农

民对于土地情感关系是否仍在延续,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土地情结变迁的整体特征是由浓变淡,而且随着农民在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进一步改善或提高,传统社会中“土地是命根子”、“万物土里出”等土地文化信仰会进一步淡化,甚或已消失^[36],这类观点在人类学和社会心态史领域的定性研究中比较普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前绝大多数农民对土地仍然有深厚的感情。即使是那些在城市创业成功的农民,也无法割舍落叶归根、故土难离之情^[37],这类观点主要是经济学领域学者在实地调查中所总结的。另据课题组的问卷调查发现,即使农民流转了土地,但依然会投入精力监督农地使用,为农地使用选择合适的“归宿”。就此调查结果而言,表明土地依然是农民心理上的情感寄托。总之,学界对于目前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依赖是否依然存在,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同;但是情感依赖关系一旦存在,农民流转土地时所感受的痛苦就更强烈,禀赋效应更强。②农民对土地情感依赖关系的代际分化与禀赋效应。对于物品所有者而言,同一事物在不同的环境情景下,其纳物入心的“人—物”关系情感不同,承载着不同的主观含义,产生的损失规避心理及其禀赋效应不同。已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有可能对物品形成依恋^[38],产生禀赋效应。这意味着,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依赖可能存在代际差异。有学者指出,代际差别对土地价值观的影响逐渐显现。50 后和 60 后的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走出农村寻找新的出路,他们生存依赖于土地,就业依存于土地,将精力、时间、努力和注意力等投入到土地中^[39],长期的土地事实占有和使用,他们会久而久之、日积月累地形成“恋地”情感,使自我与土地成为一体,将土地视为其自我身份的表达手段,由此强化农地的人格化财产特征;而 80、90 后农民通常认为,从事农业辛苦,而且难以致富,他们不愿留在农村,更愿意到城市生活。正是由于他们不再局限于安土重迁的思想圈子,更多地是想摆脱农业劳作,逃脱土地的束缚,因而对土地的情感相对淡薄。由此认为,不同年代的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依赖存在差异性。这可能会导致不同年代农民在农地流转中表现出的禀赋效应存在代际分化特征。

三、“人—物”权利关系与禀赋效应：一般物品到农地流转

1.“人—物”权利关系与禀赋效应：一般物品交易

产权权利是影响禀赋效应的重要因素^[40]。但对于权利强化究竟是提升还是弱化禀赋效应,目前学界并未达成一致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权利强化增加会提升禀赋效应,其作用机理是:随着个体从不完全拥有物品到完全拥有物品,会比拥有前更喜欢该物品,有更强的依恋感,这种对已拥有物品的依恋感所产生的额外效用,被称为所有权效用^[41]。Rachlinski 等明确指出,禀赋效应的大小与所有权形式有直接的关系,所有权完全占有情况下,产生的禀赋效应较强^[42]。所有权部分占有情况下,由于产权面临与他人分享的不确定性,导致不产生禀赋效应或禀赋效应较弱。这意味着,当人们出让完全拥有的物品时,除了失去物品本身外,人们还损失了所有权效用,基于对这部分效用的补偿需求,会导致物品的价格被高估。进一步地,不仅是事实上的产权强度提升会强化禀赋效应,甚至想象的而非真实的所有权也会使得人对物的评价发生改变,使其在交易中提高物品估价,提升禀赋效应^[4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产权强度增加会减少禀赋效应^[40]。因为权利增强,可以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提升个体在交易中的收益预期并减少消极的损失预期,由此降低个体的损失规避心理及其禀赋效应强度。进一步地,对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交易中的比较研究发现,对于所有权不明确的公共物品,个体表现出更为显著的禀赋效应,会比私人物品的禀赋效应多四倍多^[44]。上述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产权强度对禀赋效应的作用机理,但缺乏相关的实证证据来判断观点的正误。

2. 人地权利关系与禀赋效应

(1)地权强度认知与禀赋效应。土地产权状态表达了人对物的主体资格,界定了以土地为载体的产权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土地产权的客观状态及其主观认知不同都会对禀赋效应产生影响。一方面,土地产权本身的客观状态不同,人们对交易物的价值判断会不同。改革以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以赋权的身份化(成员权)、确权的法制化(承包合同)、政策的稳定化(长久承包权)为主

线^[45],由此使得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不稳定转向稳定、从不完全转向完全,成了实质上的用益物权,产权强度逐步提升。那么,产权强度的提升,究竟会增加还是减弱禀赋效应呢?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仅钟文晶等以是否签订承包经营合同表达产权强度,采用描述统计方法分析了产权强度对禀赋效应的影响,其结果表明:确权会增强农户的禀赋效应^[6]。但是这一结论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该文并未进行进一步分析;而且该研究以农户为分析单位,不符合禀赋效应是个体判断的概念逻辑,降低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人们对物品的产权认知状况也会影响个体对物品的估价,进而影响禀赋效应的强度。罗依·普罗斯特曼等对中国七个省市中 240 家农户的 119 次访谈,发现农民是土地的“准所有者”,其“准所有”的程度超过了 1979 年集体农业化解体之前的状况^[46]。晋洪涛等的调查表明,农民的土地产权认知状况与国家相关法律制度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农民中持有土地产权私有观念是普遍现象^[47]。但他们的研究并不涉及产权认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分析。2009 年我国推动了新一轮的农地确权试点工作,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用 5 年时间基本完成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罗必良等认为,新一轮确权的法律保障效应可能会增强农地作为被身份化了的人格财产特性,由此强化其禀赋效应并增加对农地流转的约束,但并未就此进行实证验证分析^[45]。

总之,尽管已有研究关注了产权强度对农民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的影响,但以确权为主线改革导致的事实上产权强度提升,或是农民对土地产权强度的认知状态,究竟会对禀赋效应产生何种影响,仍有待系统规范的实证验证。

(2)农民对地权强度认知的代际分化与禀赋效应。同一种客观存在的土地产权状态,对于不同个体而言,所感知的产权强度会呈现差异性,进而导致个体表现出的禀赋效应强度不同。事实上,农民在经济、社会政治地位上的分化会导致其对农地产权认知和偏好的差异。陈胜祥通过对 1995—2008 年国内农业经济领域重要期刊上有关农民土地产权意识的文献进行 Meta 分析^①发现,农民土地所有权认知状况与其年龄、学历、职业及社会地位等有关^[48]。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农民的产权意识比较强,更加注重维护自身的权利。吴红宇等对东莞调查表明,新一代农民工已经意识到保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并且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有强烈的要求^[49]。钱忠好等对江西省鹰潭市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对 50 岁以上的农民而言,新一代农民有更强的产权认知^[50]。这意味着,我国推进的农地确权改革可能更容易被新一代农民所感知,不同代际的农民会形成不同产权强度的认知,进而在农地流转中形成不同的禀赋效应强度。

四、结论与讨论

以行为心理因素为切入点,已有学者将禀赋效应引入到农地流转问题的研究中,初步验证了禀赋效应在农地流转中的存在性及其对农地流转的抑制作用。但是,已有研究以农户代替农民个体展开研究,这可能会导致主体回应偏差,降低研究结果的可信度;而且已有研究并未全面系统地探究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回答禀赋效应因何而产生;也未关注禀赋效应作为一种行为心理特征可能存在的代际差异特征,由此也就无法辨识禀赋效应是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长期性抑或短期性因素。

综上,本文以农民个体为研究对象,从人地关系角度出发,归纳形成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如图 1。该框架旨在说明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源于人地关系的影响,包括人地依赖关系和人地权利关系两个方面,其中,人地依赖关系又包含人地客观依赖关系和人地情感依赖关系。人地依赖关系程度决定了农民在“人—地”剥离过程中所丧失的客观功能支持及其所感知的痛苦程度,从而影响农民的损失规避心理和禀赋效应的强弱。至于人地权利关系强度究竟如何影响禀赋效应,有待通过系统规范的实证研究对两种不同的观点进行验证。进一步地,人地客观依赖关系、人地情感依赖关系以及人地权利关系的认知都会因主体不同而发生变化,由此影响禀赋效应的存在性

① Meta 分析又称“荟萃分析”,是指对具备特定条件的、同课题的诸多研究结果进行综合的一类统计方法。

及其强度。所以,需要引入代际视角进行考察。当然,这一框架涉及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显著性程度、作用方向及其强度等,仍有待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从而为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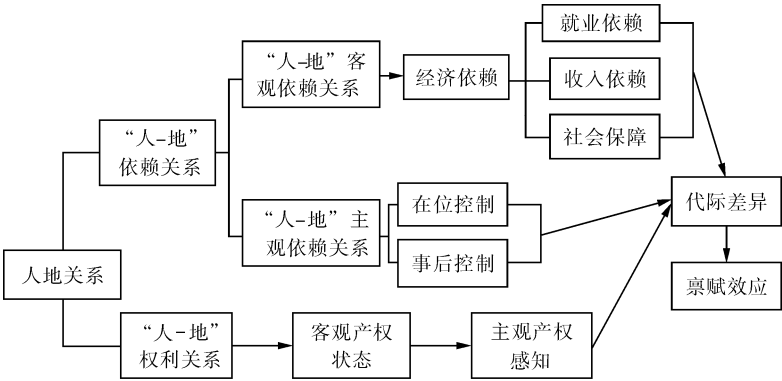


图 1 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

参 考 文 献

[1] 何秀荣.公司农场:中国农业组织的未来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9(11):4-16.

[2] 冀县卿,钱忠好,葛轶凡.交易费用、农地流转与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J].江海学刊,2015(2):83-89.

[3] 钱忠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J].管理世界,2002(6):35-45.

[4] 何国俊,徐冲.城郊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分析——基于北京郊区 6 村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7(5):111-124.

[5] 田传浩,陈宏辉,贾生华.农地市场对耕地零碎化的影响——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J].经济学(季刊),2005(3):769-784.

[6] 钟文晶,罗必良.禀赋效应、产权强度与农地流转抑制——基于广东省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3):6-16.

[7] 陈通,孙亚文,江雪莹,等.风险认知、负面情绪与农地流转意愿抑制——以禀赋效应为中介[J].湖北农业科学,2014,53(21):5304-5309.

[8] THALER R H.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980(1):39-60.

[9] 侯佳伟,窦东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及其代际差异[J].南方人口,2012,27(6):69-77.

[10] TVERSKY A,KAHNEMAN D.Loss aversion in riskless choice:a reference-dependent model[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4):1039-1061.

[11] KAHNEMAN D,KNETSCH J L,THALER R H.Experimental tests of the endowment effect and the Coase theorem[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6):1325-1348.

[12] MACDONALD H F,BOWKER J M.The endowment effect and WTA :a quasi-experimental test[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1994,26(2):545-551.

[13] 卿志琼.禀赋效应、财政幻觉与公共政策——拆迁中情绪事件的行为经济学分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127-136.

[14] VAN KOOTEN G C,SCHMITZ A.Preserving waterfowl habitat on the Canadian prairies:economic incentives versus moral suasion[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2,74(1):79-89.

[15] 余朝阳.坚持还是放手? 产品情感依恋对消费者参与协同消费意愿的影响——基于产品处置视角[D].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4.

[16] REBECCA W E.Product disposal[D].Austin: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2006.

[17] KAHNEMAN D,KNETSCH J L,THALER R H.The endowment effect,loss aversion,and status quo bia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1,5(1):193-206.

[18] JACOBY J,BERNING C K,DIETVORST T F.What about disposition? [J].Journal of marketing,1977,41(2):22-28.

[19] KAHNEMAN D,TVERSKY A.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D].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20] CHAPMAN G B.Similarity and reluctance to trade[J].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1998,11(1):47-58.

[21] VAN DIJK E,VAN KNIPPENBERG D.Wanna trade? Product knowledge and the perceiv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rade[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5,35(1):23-34.

[22] 陈少明.心外无物:从存在论到意义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4(1):68-84.

[23] 黄劲松,孙建伟.禀赋效应对产品更换决策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9,41(8):737-744.

[24] DHAR R,WERTENBROCH K.Consumer choice between hedonic and utilitarian good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2000,37(1):60-71.

[25] CARMON Z,WERTENBROCH K,ZEELENBERG M.Option attachment:when deliberating makes choosing feel like losing[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3,30(1):15-29.

[26] RADIN M J.Reinterpreting property[D].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27] AHUVIA A C.Beyond the extended self:loved objects and consumers' identity narratives[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5,32(1):171-184.

[28] 张建雷,王会.土地的道义经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再认识——基于安徽省 L 村的实证调查[J].学术论坛,2014(5):108-113.

[29] 游和远,吴次芳.农地流转、禀赋依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J].管理世界,2010(3):65-75.

[30] 石智雷,杨云彦.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J].社会学研究,2012(3):157-181.

[31] 周其仁.产权改革和新商业组织——中国和俄罗斯农业改革的比较[J].国际经济评论,1997(Z3):22-25.

[32] 黄海艳,张藕香.农民分化与土地流转意愿关系研究——基于安徽省农户样本的调查[J].新疆农垦经济,2015(1):5-12.

[33] 张藕香.农民“双重”分化代际差异:基于安徽省的调查分析[J].劳动经济评论,2015,8(1):142-156.

[34] 卢海阳,梁海兵,钱文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与政策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5(7):26-36.

[35]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出版社,1948.

[36] 陈胜祥.分化视角下转型期农民土地情结变迁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13(6):35-41.

[37] 康来云.乡土情结与土地价值观——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农村土地的历史变迁[J].河南社会科学,2009,17(5):46-48.

[38] LAMBERT-PANDRAUD R,LAURENT G.Why do older consumers buy older brands? The role of attachment and declining innovativeness[J].Journal of marketing,2010(74):104-121.

[39] 陈英,谢保鹏,张仁陟.农民土地价值观代际差异研究——基于甘肃天水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27(10):51-57.

[40] INESI M E.Power and loss aversion[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10,112(1):58-69.

[41] LOEWENSTEIN G,ADLER D.A bias in the prediction of tastes[J].Economic journal,1995(105):929-937.

[42] RACHILINSKI J J,FOREST J.Remedies and the psychology of ownership[J].Vanderbilt law review,1998,51(6):1541-1582.

[43] ERICSON K M,FUSTER A.The endowment effect[R].Working paper,2013.

[44] HOROWITZ J,MC CONNELL K.A review of WTA/WTP studie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2(44):426-447.

[45] 罗必良,胡新艳.中国农业经营制度:挑战转型与创新[J].社会科学家,2015(5):3-6.

[46] 罗依·普罗斯特曼.解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存问题的途径探讨[M]//缪建平.中外学者论农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

[47] 晋洪涛,史清华.农村土地权属:农民的“非集体化”认知与根源——基于河南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1(1):7-12.

[48] 陈胜祥.农民土地所有权认知与农地制度创新——基于 1995-2008 年实证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09,23(11):21-26.

[49] 吴红宇,谢国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利益诉求及角色变迁——基于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析[J].南方人口,2006,21(2):21-31.

[50] 钱忠好,肖屹,曲福田.农民土地产权认知、土地征用意愿与征地制度改革——基于江西省鹰潭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4(1):28-35.

(责任编辑:陈万红)